

DUKU

读库

0902



藏书票：姬绍华

编号：0902

DUKU0902
2009.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0902/张立宪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225-673-6

I. 读…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1622 号

读库 0902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 × 925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73-6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01-21	穿越“五四”	傅国涌 郭初阳 蔡朝阳 吕 栋 林建刚
22-53	威廉·林赛的长城二十年	赵 萌
54-88	母亲和我	熊景明
89-102	主场作战	何伟 (Peter Hessler)
103-127	海子的事	刘 春
128-139	淡水天文	刘志凌
140-159	十七年间的小说	谢其章

160-189	刘别谦式触动	张 明
190-205	谁是刘别谦	张 明
206-240	乡愁诗人	刘 柠
241-252	“我猜想，他就是人民”	张铁志
253-295	中国宝贝	李多钰
296-310	一沙一世界	刘 旻
311-317	神物	赤 军

穿越“五四”^①

傅国涌 郭初阳 蔡朝阳 吕 栋 林建刚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

——陈独秀

一 “五四”新潮

1920年1月，“五四”高潮渐渐退去，来自北京、天津的四个学生代表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来到上海法租界莫里爱路29号的孙中山住宅。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才见到孙中山。张国焘和许德珩的回忆录都记下了见面时的情景。

孙中山和他们谈了三个多小时，在肯定学生的行动后，他话锋一转：“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告。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

^① 本文为正在筹拍的电视纪录片解说词。

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此前，还在“五四”高潮的1919年七、八月间，孙中山给代理蔡元培执行北大校务的蒋梦麟写信，希望蒋“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机会听到托马斯·杰弗逊在1801年总统就职演讲时说的那句话：“武力是专制的首要原则与直接源头。”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国一直处于以暴易暴的血腥轮回中，暴力决定论根深蒂固，似乎任何的社会变革都只能依赖于暴力。手创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也未能跳出这一观念的怪圈。“五四”是一次和平、非暴力的集体行动，通过上街游行示威等方式，直接诉诸人的良知和理性，希望动员社会舆论的力量，迫使当权者作出正面的回应。孙中山虽然支持学生反对北京政府的行动，对于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却有些不以为然。

确实，“五四”学生手无寸铁，也并不打算拿起武器，他们只是办刊、结社、写文章、做演讲、游行示威、奔走呼告，如此而已。去见孙中山的四个学生中，三个是北大新潮社、国民社的成员，刘清扬则来自天津的觉悟社。这一代青年学生，热烈地追逐、讨论各种新思潮、新价值，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从《新潮》、《国民》到《觉悟》、《浙江新潮》、《湘江评论》，这些学生刊物无不充满青春的气息，带着露水般的清新。他们努力摆脱旧观念的束缚，热切地拥抱新文化，他们就是新文化塑造的新一代知识公民，尽管后来踏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

在学生的背后，是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岁的老师辈，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这些人。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专长和兴趣，在那个时代，他们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磁心，彼此吸引和靠近。这一聚合，形成了巨大的能量。正是《新青年》首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建设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不留情面地批判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继失败的背景下，这些不以政治为业，而把学术视为立身之本的新型读书人站到了时代的前面，他们试图为这个古老民族呼唤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

许多年后，《新青年》早已消失，当事人之一胡适这样评价这本杂志：

“《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堪称这本杂志护法的蔡元培则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

如果不是蔡元培在1916年接受总统黎元洪的任命，出掌北大，也许就不会有“五四”这云蒸霞蔚的一幕。历史选择了蔡元培，正是他“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直接把《新青年》以及它所裹挟的新思潮带进了北大，推向了全国。也正是因为蔡元培，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些基本的现代大学理念才会在北大生根发芽，形成制度。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才应运而生，百花齐放。拖着长辫讲英文的辜鸿铭、信奉帝制的国学大师刘师培，才会和刘半农、胡适、周作人这些新人一同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一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放射出迷人的光华，映照在那一代知识人的脸上。

北大二十周年校庆，以曲学名世的北大教授吴梅写下的校歌中有动人的一句：“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八十年后的北大百年校庆，剧作家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干脆就叫《幸遇先生蔡》。

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陈独秀在《中央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他们三个人，蔡元培年龄最大，当时已年过半百；胡适最小，进北大时只有二十六岁。一个小小的巧合，他们都属兔。三只小兔子，开创了一个大时代。

1915年2月21日，青年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1916年他在写给一位美国教授的信中说，通向开明而有效的政治，没有捷径可走。他不赞同革命，而宁愿从基础建设起，“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2001年8月，老北大门前那条繁华的五四大街上，出现了一个三角形

的大型不锈钢浮雕，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上部有“1919.5.4”字样；浮雕在醒目位置镌刻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的头像，青年毛泽东的头像位居中心，陈独秀的头像则在左下方不显眼的地方，甚至不如他自己创办的《新青年》封面大。如此布局，显然有违历史的真实。“历史新的一页”从哪里翻开？不正是从陈独秀和他创办的这本小小的杂志吗？

在选择办刊之前，陈独秀反思过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意识到这块古老的土地缺乏深入人心的启蒙，所以总有人想做皇帝。他创办《新青年》，重心不在批评时政，他主张“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时政。

1918年7月15日，他在《新青年》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得出了三条极为重要的结论：一要排斥武力政治。“‘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无论何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国法人言，无所顾忌，尚复成何世界！”二要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培植容让敌党的雅量。三要下定决心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2003年，也是在五四大街上，出现了另一座几十米的长方形浮雕《曙光》。在这个浮雕上，第一个大的头像就是陈独秀，然后是蔡元培、李大钊、鲁迅……以及他们的作品、警句、格言等，整个浮雕重现了“五四”的氛围，让关注中国历史的人们稍感欣慰。

有人说，“五四”最大的功绩是提倡白话文。从文言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到白话的“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从文言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到白话的“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从文言的“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到白话的“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从文言的“水火金木土”，到白话的“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表达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展开。1917年，《新青年》开始采用白话文，1920年，教育部就在小学推广白话。不过三年时间，文言和白话，就像胡适诗里的两个黄蝴蝶，可以名正言顺地双双飞上天了，一个口语与书面语合一的新中国悄悄浮现。

面朝大海，敞开胸怀，这是“五四”的开放姿态。在梁启超、胡适等人推动下，由北大和民营的商务印书馆资助，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

家罗素和东方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等重量级人物相继登陆，他们到处讲演，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新的精神资源。杜威访问中国之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对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思想，怀有这样一致和热烈的兴趣。”罗素访华回国后，写了一本《中国问题》，称赞中国的新式学校和大学，“不是培养强烈的国家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的场所”。就是在送别杜威回国的当天，北大学生孙伏园在北京《晨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抱着万分痛心，感谢他们都尚不厌弃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乍看令人气馁，多读几遍，就可以发现里面可贵的自我反省精神。

美国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认为，“五四”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化上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代表人物的思想都太激烈了。这个论断也影响了一些中国学者。

在“五四”的报刊上，我们的确能读到一些激烈甚至显得极端的言论。鲁迅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钱玄同说，救中国的唯一方法是推翻孔学，而前提是废除汉字；胡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学生领袖傅斯年把旧式家庭看做万恶之源，“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他还说，中国人就和中国的狗一样，虽然聪明，却没有责任心。

称“五四”代表人物激烈地全盘反传统，大概就体现在这些片言只语里。

事实上，他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有着实际的贡献。胡适主张整理国故，晚年最热衷的是《水经注》版本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著述谨严，开拓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傅斯年主持整理清朝内阁档案，发掘殷墟，在古史研究上卓有建树。

在《新青年》作者群之外，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持有更为温和的态度，比如1917年创刊的《太平洋》作者群，晚一些的《学衡》一群更是以捍卫传统文化为目标。在北大学生当中，有办《新潮》、主张白话文的，也有办《国故》、主张文言文的，这针锋相对的两种刊物，都得到了校方的支持。在杭州，浙江一师的学生创办了《浙江新潮》（《钱江评论》），倡导

白话文，倡导新思潮；同时也有一位叫凌独见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本捍卫文言文的杂志，名为《独见》。他们的背后各有老师辈的支持。

说到底，即便是那些听起来触目惊心的激烈言论，蕴含着的还是理性的内核，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追问，用新尺度来重新估定价值，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以作文满分、数学零分考入北大英国文学系，“五四”游行时执笔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罗家伦，1920年曾在《新潮》上发表文章说：“在政治专制之下，是不能容批评的精神的。中国因为从来没有批评这件东西，所以人家对于批评和骂分不清楚，所以我们批评他，他就以为我们骂他；所以他就要记恨，就要真的还骂……”他用“三W主义”来概括批评的精神，那就是“What”（什么），“Why”（为什么），“How”（要什么）。“三W主义”，是对一切传统价值的重新理解，是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理性对话，这是具有批判思维的现代公民的要素。

“五四”之光点亮的一代新人，已在红楼内外、大江南北成长起来。1906年出生在浙江的文人胡兰成在《山河岁月》的最后有一句话：“五四时代是个分水岭，从此军阀要过时，国会的花要谢，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以来的士，从袁世凯训练下来的新兵，都要让给新的知识分子与北伐革命军了。”

二 多元“五四”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二。这一天的天气，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里已漫漶不清了。冰心记得“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王统照记得“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正是典型的春夏之交。

那天上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口号、标语和旗帜仿佛海潮般涌动。下午两点多，三千多人的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阵风所到之处，尘雾弥漫。在东交民巷口上，队伍被宪兵阻止，罗家伦等四个学生代表进入美国使馆，希望美国政府能在巴黎和会上给予中国同情和援助。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美国公使芮恩施到潭柘寺去了，英、法、意三国公使也都休息。北京下午的风沙中，浩荡的队伍在巷口苦等近两个小时，毫无结果，一种不满的情绪弥散开来，群情激愤之下，有人高呼去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示威，游行队伍就这样临时转向赵家楼。

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加上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正是当时学生眼中的亲日派卖国贼。游行队伍前的白布挽联，矛头即直指曹、章二人。学生的满腔怒火在到达曹宅时一下子发泄出来，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未及躲避，被学生们用砖头瓦片痛殴，满脸是血，伤及脑骨。混乱之中，曹宅起火，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才扑灭。军警开始捕人，结果有三十二个学生银铛入狱，这一消息震动了京城，并迅速传遍全国。

当晚，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召集的大会上说，发生这种事，自己要引咎辞职：“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随后他只身前往警察厅。第二天，他与十三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商量保释学生。他们联名通电各省教育会，呼吁采取一致行动；接着，他们去见总统、总理、教育总长和警察总监，但都无功而返。北洋政府试图关闭参与游行的学校，因为教育总长傅增湘三天内三次递交辞呈而作罢。

抗议抓捕学生的电文，每天像雪片般飞进北京。消息传到一个苏州小镇，小学教师叶圣陶拍案而起。连戊戌变法后已落在时代后面的康有为也发表通电：“吾全国人民宜唤醒以救被捕之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被捕之学生，而诛卖国贼。”

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被保释返校，受到英雄般的接待。

三十二个被捕者之一、北大学生、国民社和《国民》杂志重要发起人许德珩在“五四”当夜口占一律：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赵家楼的火光映红了历史的天空。这一事件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充满争议。扛北大校旗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曾力阻游行队伍不要转向赵家

楼，劝说无效，傅斯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至于起火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版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说赵家楼的火是他点燃的。到了1957年，当年的游行学生，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杨晦还在推测，火可能是曹家自己点的，这样可以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抓人就有了理由。1957年5月4日，北大《红楼》杂志第三期推出“纪念五四特辑”，杨晦教授的《五四杂忆》由北大中文系女生林昭记录、整理，发表在上面。

“五四”次日上午，北大照旧上课，罢课要到下午才开始。到过赵家楼的法律系一年级学生陶希圣清楚地记得，第一堂课是刑法，主讲教授张孝谔的另一个身份是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对于赵家楼事件，他缓缓说道：“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自己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是宪法，教授钟赓言是法制局的参事，他走进课堂，泪随声落，全班学生也潸然泪下。

北大哲学系讲师梁漱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尊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得不清楚，我们尽可以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决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梁漱溟最后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初想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呈请总统特赦。一方顾全了法律，一方免几个青年受委屈。”

然而《国民公报》记者、曾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三少年”之一的蓝公武却不同意这个看法。第二天，他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群众运动是一个意志，一种共同的情感作用，没办法分别首从轻重，“是学生团全体做的，要有罪全体都有罪”，何况被捕的学生是学生散后随便在街上抓来充数的，怎么可以把罪名移在这几个人身上？蓝公武的观点，是从群众心理学出发的。

5月10日，三十二名保释学生收到法庭传讯，他们拒绝填写无罪抗辩书，宣称“这是完全出自良心的自由行动”，根本不是犯罪，并且声明今

后“决不能再受非法之提传”。

纪念“五四”二十八年时，胡适说：“‘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运动。‘五四’之后，有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与的新文艺运动、新思潮运动，和各种新的政治活动。”

“五四”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时代的代名词。那当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时代，但不可否认，那确实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一个给人们提供不同选择的时代，一个具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各种思潮滚滚而来，陈独秀向往法兰西，胡适对美利坚心悦诚服，蔡元培则以柏林大学作为北大的范本。很多青年被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所吸引，一位四川少年干脆从这两个名字中各取一字，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巴金”。1919年章廷谦的感受最为真切，那时他刚从山西大学转到北大，“真像是乡下人进城，美不胜收……课堂里、刊物上、宿舍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听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主张……”

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各种思潮涌动，几乎要把做梦的青年淹没。在各种思潮的牵引下，北京、长沙、天津、杭州，乃至一些更小的城镇，自发的社团遍地生长，如同春草一般。新潮社、国民社、新民学会、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这些志同道合者，从一个学校，扩大到一个城市，再扩大到整个国家。在学生、读书人之外，工商界的结社更早也更健全，新闻界、教育界的组织也渐渐成熟。在上海总商会和江苏教育会的推动下，全国各界参与的“国是会议”1922年在上海举行，并拿出了自己的宪法草案。

那个时候的人们仿佛天生就有思想、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以后朝各种不同方向走去的莘莘学子，傅斯年、罗家伦们，左舜生、曾琦、李璜、陶希圣们，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施存统、许德珩们，巴金、叶圣陶、郑振铎们，徐悲鸿、刘海粟们，当然还有张国焘、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们，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孕育出来的，就像一棵棵树，长在众声喧哗的溪水旁，最终结出了各自不同的果实。

人们常说，“五四”的中心题目是民主与科学。“五四”的当事人、后

来成为历史学家的左舜生却说：“‘五四’的导因，固然是起于争外交和打卖国贼，但却从政治上的运动扩展到一般的思想文化上，后人把这一运动的目标，归纳于‘民主’与‘科学’，虽然已算扼要，但仍嫌狭隘；‘五四运动’充沛了一股活力，洋溢着一种热情，它的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而且在求美，对文学艺术要求的热烈，是在以往任何一种运动中所没有的，单调的民主可流于形式，单调的科学可陷于枯涩，赖文艺有以润色之，然后才做到笃实光辉，使人不倦。”

正是这样绚烂多彩的一个时代，提供给了不同的人选择不同信仰、主义、理想的机会。“五四”也因此而令人神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王来棣奉命对中共建党的创始人做了一系列采访，幸存下来的访问稿，在半世纪后结集成《中共创始人访谈录》。那时，很多年轻人的信仰并不明晰，包括刘清扬、邓颖超等许多人，都说自己是从信仰无政府主义开始的。而在成熟的知识分子之间，思想、价值的取向同样是多元的。围绕着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陈独秀和杜亚泉在《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上有过一场论战。杜亚泉来自浙江绍兴，有深厚的旧学根底，但他不是一个老古董，热衷于物理、化学等新学科，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理化部主任，主编了大量理化类教科书。他主持老牌的《东方杂志》长达九年，被誉为这本名牌杂志的保姆。他主张东西方文化调和，在创造新文明的过程中，不应该排斥固有的文化。他认为不可能一家学说独放光彩，而应该兼容不同的主义与学说。陈独秀则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野蛮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则是文明的文化，东西方两种文化决不能调和。对于陈独秀的疾言厉色，杜亚泉在《论思想战》一文中提出两个原则：“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

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欧美留学生，因为办《学衡》被称为“学衡派”，他们与《新青年》群体在白话文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等问题上有着不同见解，几乎是针锋相对。

自十九世纪末维新运动以来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梁启超，搞了大半生政治活动，1918年12月26日，他在前往欧洲考察前夕做出一个决定，要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在此前后，围绕在他身边的一批朋友包括张君勱、张东荪、蒋百里等人，也即所谓的“研究系”，他们掌握着北京《晨

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等重要报纸，也发起了“新学会”、“共学社”等学术团体，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介入到新文化、新思潮运动中。但梁启超对政治始终不能忘情。当胡适等人在“五四”浪潮中崛起，他迫切希望与他们携手，甚至想拉他们一同组党，但胡适他们拒绝了。李大钊在1921年初写信给胡适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

爱惜羽毛的胡适和蔡元培一致拒绝与梁启超结盟，令梁启超耿耿于怀。林长民甚至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

即使看起来站在同一边的“五四”代表性人物当中，他们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胡适和陈独秀，两个安徽的“小兔子”，不仅为人处世态度迥异，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也有相当的不同。倡导白话文时，陈独秀有一种“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决绝与激越，而胡适温和而宽容，说话、做事处处留有余地。他相信“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陈独秀倾向于法国的启蒙主义，而胡适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

北大教授、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与胡适不仅同事，而且都是《新青年》的同人。当李大钊写文章热烈地谈论布尔什维主义时，胡适感到任何主义一旦被信仰，就有变成教条的危险，就有可能导致思想上的僵化与停滞。1919年7月，他写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蓝公武写文章与他商榷，他又写文章回应，这就是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陈独秀与李大钊指向的是美好的明天，为了这一美好而具有道德正确性的目的可以牺牲眼前。胡适指向的是并不完美的今天，要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中寻找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多年以后，胡适不断强调一句话：仅做好事是不够的，必得用好的方式去做。

当时，这些争论只是观念之争，不仅没有影响彼此的友情，而且，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仍保持着足够的共识。1920年胡适等七个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李大钊就是签名人之一。1922年，身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南陈北李”之一，李大钊在提倡“好政府主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在十六个签署人中，包括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多数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

三 “五四”后援

1919年6月11日晚，北京“新世界”的下层露台上，像往常一样，坐满了看电影的人，忽然有无数的传单在空中飘扬，随风翻飞，屋顶花园上闪过一个白帽西服的身影。

亲手撒传单的陈独秀，立即被京师警察厅暗布的便衣拘捕。这份传单名为《北京市民宣言》，是他起草并由胡适译成英文，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而每一条几乎都足以令权贵恼羞成怒。

就在三天前，这位负有盛名的北大教授写下一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1919年的陈独秀早过了“酒旗风暖少年狂”的年纪，他已是四十一岁的中年，但在他的笔下写出“我们青年”，却是那么的自然贴切。

6月13日，《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在南北激起反响。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

北京的教师，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江苏省教育会、北大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等团体，章士钊、岑春煊等名流，以及反对“五四”运动的辛亥元老田桐，纷纷发表函电，呼吁政府立即释放陈独秀。

6月25日，中华工业协会在《时报》刊出通电：“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

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以一往无前的姿态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那时正笼罩着奇异的光环，确是万千青年心目中的明星。

当时，就连安徽省长吕调元、安徽同乡会与安徽籍在京官绅，甚至反